

《从清华园到未名湖》连载 11

# 思潮的困惑与出路(之二) ■任彦申

从清华园到未名湖

任彦申 著

实行“双百”方针,需要有一种宽容、宽松、宽厚的社会心态和思想环境。宽容是多元共生的条件,是避免多元冲突、矛盾激化的缓冲地带,也是求同存异、最终达成社会共识的途径。宽容不是弱者对强者的乞求,也不仅是文人之间的包容性美德,更重要的是对强者、对当权者而言的。只有有权有势的人才讲宽容的资格。作为领导者应当懂得,对待文化人,处理文化事,不要轻率地显示权力,动用权威,而应当尊重思想自由的价值,承认多元共生的权利,容忍异己声音的存在,慎用手中权力,避免强加于人。

当然,任何宽容都不是无原则、无边界的,它必须以合法为原则,以不伤害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为界限。正如伏尔泰所说:由于他们不是疯狂者,所以才值得被宽容。

我们见识过这样一类学者:他们自以为“世人皆浊我独清,世人皆醉我独醒”,几乎看不惯周围的一切,与现实格格不入。

他们以“思想者”、“批判者”自居,不愿去做任何脚踏实地的建设性工作,对行动者、建设者总是百般挑剔,对油盐酱醋茶等生活事务懒得理睬,对国家利益、社会大局也满不在乎,似乎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。

他们凭借着一点小才气、小聪明便傲视一切,天地之间唯我独尊,别人朝东他偏朝西,语不惊人死不休,处处显示与众不同。对过去的一切他们都要重新评价,而且专门喜欢挑战名人,以为只要和名人交火自己也便是名人了。

他们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,而自己从不懂得尊重别人;他们希望别人宽容自己,而自己从不想宽容别人。

这种人实际上是学术队伍中的害群之马,是自由宽松环境的干扰者和破坏者。在社会的多元意识形态成分中,并不是不分主次、平起平坐、各行其道、互不干涉,其中必定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,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应当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密切适应,应当具有先进性、普适性,对其他意识形态具有统领和整合的作用。

中国是一个大国,地域辽阔,人口众多,56个民族经过数千年的分分合合而整合成一个统一整体,再加上地区之间、民族之间、各种人群之间在发展水平、文化特点、宗教信仰、生活习俗等方面有很大差异,因此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、共同的社会目标以及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公共价值观,否则,就会四分五裂,一盘散沙,纷争不已。

在当今中国,这种统一的指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。这种马克思主义不是外部力量强加的,也不是照抄照搬过来的,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。这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适合中国国情,扎根中国文化,以能够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目的。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,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。这三大理论成果都紧紧围绕着“拯救中国”、“振兴中华”这两个近现代中国的头号问题,正确地回答了怎样进行中国革命、怎样建设社会主义、怎样建设中国共产党这些根本问题,以强国富民的实际赢得了人民的信赖,并被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为

指导思想。在当代中国,只有这些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,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我们决不能轻信别人的诱惑或屈服于外部的压力,轻易地放弃自己的指导思想。

## 多元激荡的文化发展趋势

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以后,随着思想禁锢的不断破除、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化,我国的理论界、文化界、学术界打破了以往的沉寂局面,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,理论探讨空前活跃,学术争鸣蓬勃展开,这是理论创新的广阔舞台,是马克思主义者施展身手的大好机会。尽管这种活跃中不乏混乱,存在着杂音和干扰,但总体上说,它适应了改革开放的需要,冲击了一切不合时宜的旧体制、旧观念,为深化改革、扩大开放开辟了前进的道路。

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,造成了经济成分的多样化、就业方式的多样化、组织形式的多样化、利益关系的多样化,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多样性、自主性和选择性,思想文化多元化这已是一种不争的事实。

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,把整个世界连成一片,它打破了文化的地域封锁,使“思想无国界”变成了真正的现实。一张“互联网”几乎把所有国家一网打尽,网在其中。跨国文化传播可以越过政府、越过海关,越过千山万水轻而易举地进行,形成了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难解难分的局面。各国的实力有强弱之分,但各国的文明无优劣之别。不同文明之间应当对话而不对抗,交流而不封闭,兼容而不排斥,努力追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“各美其美,美人之美,美美与共,天下大同”的理想境界。当前,某些西方强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、先进的科技手段和丰富的市场运作经验,强势推进西方文明,企图用自己的文明模式一统天下,我国民族文化的生存发展受到了严重挤压。有人曾经设想在打开门户时装上纱窗,只让新鲜空气进来,而把苍蝇蚊子挡在外边,其实这是一种很幼稚的想法,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。

党的十六大报告高度概括了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两大显著特点:一是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,二是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。这种多元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过程,是一个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、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、健康文化和腐朽文化、现代文化与古代文化之间有吸纳又有排斥、有融合又有斗争、有渗透又有抵御的复杂过程。我们应当适应这种多元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状况,不能企求回到过去那种舆论一律、一种观点畅行无阻、一种声音一呼百应的局面。不要一发现异己的意见就惊慌失措、随意指责、追究责任。在文化建设中,如果妄自尊大、封闭自守,拒绝学习借鉴其他先进理念和文明成果,那就意味着自我衰落。如果妄自尊大、盲目崇洋、数典忘祖,那就意味着自取灭亡。根本的出路在于把中国自己的先进文化做强做优,不断增强自身的实力、活力和竞争力。

思想文化多元激荡的状况不是坏事,也并不可怕,它为理论创新、学术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。真正的科学理论和先进文化是不怕经风雨、见世面的。有多元才能筛选,有

比较才能鉴别,有竞争才能自我奋进,有斗争才能提高自己的战斗力。

北大的讲座是校园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,它充分体现着北大的文化特点和精神魅力。北大有上百个学生社团,每年举办近千场各类讲座。如果说学生的课堂教学是严格按照教学计划、教学大纲,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,那么讲座则有很大的广泛性和自由度。只要在布告栏里发个海报,学生愿来就来,想走就走,完全是自主自愿,来去自由。在学生中流行着一种不成文的潜规则,这就是“课堂教学可以不去,但精彩讲座不能不听”;“听得懂要听,听不懂也要听”;“我不一定赞同你的观点,但尊重你的思想自由”。有些名师大家的讲座,学生常常提前几个小时去抢占座位。这些学生社团很有本事,官方请不来的一些名人、要员,学生却能请来。有些名人宁可不要报酬、不用招待也愿意前来北大开讲座。他们把在北大开讲座看作是一种荣耀。

这些讲座的突出特点是具有创新性、探索性、多元性、民主性,其中传达的多是一些新信息、新知识、新观点和新的研究成果。是处于科学文化前沿的东西。讲座的方式不是单向的灌输,而是互动的交流,有问有答,有来有往,相互切磋,平等讨论,教学相长。讲的东西新鲜生动,学生可以鼓掌;讲的东西陈旧乏味,学生可以鼓倒掌。鼓倒掌固然不够礼貌,但对演讲者来说是一种及时的现场反馈,促使他迅速改进,免得耽误时间。同时对后来者也是一种警示:北大的讲坛可不是好占领的,“没有金刚钻,就不要揽这个瓷器活”。

学校办讲座的目的,不是为了给学生提供现成的答案,而是为了启发学生思考问题;不是希望学生简单认同,而是为了使学生在多角度观察世界。总之,是“存心”要营造一种多元文化交织的环境,让学生开阔学术视野,接触前沿知识,学会筛选,学会吸收,学会拒绝,学会抵御,鼓励独立思考,启发创新思维,增强免疫能力。比如举办一个各国驻华大使的系列讲座,每个国家的大使都会宣扬本国的历史现状、风土人情、价值观念、宗教信仰、社会模式、对外政策等等。这样,展示在学生面前的就是一个多极化的充满着矛盾冲突的现实世界,这无疑是最生动的当代国际政治课。如果有人把这个讲座提升到意识形态斗争的高度来加以质疑,认为是“放弃社会主义思想阵地,为资产阶级思想大开方便之门”,那事情就麻烦了。学校对这些五花八门的讲座也是提心吊胆,唯恐出了篓子,惹出麻烦。要取消这些讲座比较好办,而要管理好这些讲座则非常困难。因为对这些讲座不可能事先审查,不可能现场调控,也难以事后追究,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加强对学生社团的管理,教育引导好社团的骨干,对倾向不好、经常违规的社团加以必要的限制。

## 处理思潮问题的经验教训

在大学工作,你几乎天天都会遇到思潮问题,天天都会同思潮打交道。究竟什么是错误思潮?谁来裁定错误思潮?要不要集中力量加以整治?怎么整治?整治到什么程度?这些问题敏感度很高,政治性、政策性也很强。

改革开放以前,曾经开展过多次反对错误思潮的斗争,

其中的是非非、恩恩怨怨、经验教训,这里就不再讲了。改革开放以后,我们也时常受到思潮的困扰,在处理思潮问题上碰到过不少棘手的问题。

## 一.如何反对“左”、右倾向

对于改革开放中的错误思想,邓小平有过一个总体判断。他认为,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,既有“左”的干扰,也有右的干扰,但根深蒂固、危险最大的还是“左”的东西。对于“左”和右要作具体分析,要有明确的界定。所谓“左”,主要是搞教条主义、本本主义那一套,固守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,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、发展资本主义,动不动就挑起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。所谓右,主要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,主张中国“全盘西化”,走资本主义道路。不论“左”和右,都是干扰改革开放,阻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,不存在“左”比右好或是右比“左”好的问题。反对错误思潮,既要旗帜鲜明,也要实事求是。有“左”就反“左”,有右就反右,要警惕右,但主要是防止“左”。

错误思潮的存在是个长期的现象,应当警钟长鸣,但不能天天围着错误思潮转而忘记了我们的中心工作。只有当错误思潮真正形成“气候”、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、危及到社会安定团结时,才应当集中加以整治。纠正“左”右倾向,都不要随便上纲,不要人人过关,不要搞运动,尤其涉及人的处理要十分慎重。当错误思潮被控制,干扰被排除后,应当把注意力迅速集中到中心任务上来,一心一意搞建设,聚精会神谋发展,千万不要把排除干扰的斗争当成了正面作战的主战场,且战且退,忘记了我们的中心工作。只有当错误思潮真正形成“气候”、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、危及到社会安定团结时,才应当集中加以整治。纠正“左”右倾向,都不要随便上纲,不要人人过关,不要搞运动,尤其涉及人的处理要十分慎重。当错误思潮被控制,干扰被排除后,应当把注意力迅速集中到中心任务上来,一心一意搞建设,聚精会神谋发展,千万不要把排除干扰的斗争当成了正面作战的主战场,且战且退,忘记了我们的中心工作。

## 二.如何对待改革中的理论探索

理论创新很不容易,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创新比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创新更加艰难。在我国“官本位”意识很浓厚的情况下,来自民间的理论创新需要冒很大的风险。

理论的生命在于创新。任何组织,不管它曾经多么强大,如果不改革,势必走向衰败。任何理论,不管它曾经多么神圣,如果不发展,势必走向僵化。

对待理论创新,邓小平提出两条重要原则:一是老祖宗不能丢,二是敢于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“新话”。邓小平理论中最精彩、最管用的部分,正是他说出了老祖宗不曾说过的“新话”。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,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,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断,关于“三个有利于”的价值标准,关于“一国两制”的构想,等等。邓小平的伟大历史贡献,就是他赋予社会主义以新的内涵,大大改善了社会主义的形象,通过改革开放找到了一条更新社会主义的道路。

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,外部政治强权的干涉、学界内部的权威压制、学校当局的行政管制,是影响理论创新的三个外在因素。而“信而好古”的传统观念和教条主义、本本主义的束缚,是妨碍理论创新的内在原因。长期以来,大学的理论研究受教条主义、本本主义的束缚太多,就是他赋予社会主义以新的内涵,大大改善了社会主义的形象,通过改革开放找到了一条更新社会主义的道路。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,外部政治强权的干涉、学界内部的权威压制、学校当局的行政管制,是影响理论创新的三个外在因素。而“信而好古”的传统观念和教条主义、本本主义的束缚,是妨碍理论创新的内在原因。长期以来,大学的理论研究受教条主义、本本主义的束缚太多,就是他赋予社会主义以新的内涵,大大改善了社会主义的形象,通过改革开放找到了一条更新社会主义的道路。

改革需要理论支持。任何体制和政策的突破都需要以理论突破为先导。一些超前性的理论探索和创新观点,由于它突破了传统说法和流行的正统观点,冒犯了现行体制和现行政策的权威,因而在开始阶段常常受到习惯势力的攻击,甚至遭到某些领导的批评,被当作错误思潮对待。面对来自上下左右的压力,学校领导如何对待这些创新观点和理论创新者,这是一个颇费脑筋的问题。

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,我国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争鸣非常活跃。北大的一些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大胆的创新观点,主张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应当以市场经济体制取向;国有企业应当改制,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,进行股份制改造;应当支持发展私营经济;应当积极发展股票市场等。这些观点不仅在理论界引起很大争议,而且遭到某些领导部门的严厉批评,被认为是“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”、“鼓吹私有化”、“有走,渐行渐远,重新回到过去那种”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去。

对待改革中的理论探索,大学领导应当采取以下原则:在任何情况下,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学术自由的方针,维护创新的环境。在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纠缠不清时,应当“就低不就高”,先作为学术问题对待。

对于理论创新人才,要敢于保护和善于保护,勇于为他们分担责任、缓解压力、减少干扰,使他们能够继续推进和完成理论创新。任何新生事物开始都是不完善的,不能苛求责备。任何创新活动都有两种结果:正确或错误,成功或失败。科学探索不能简单以成败论英雄。对大学来说,探索真理的精神比结果更可贵。

对待外部的压力和上级的批评,学校领导要沉着应对外,不要跟风跑,不妨“一慢二看三通过”。“一慢”,就是对外不急于回应,对上不急于交账,对创新观点、创新人员不急于判断,不急于处理。

“二看”,就是看发展、看变化、看长远,不为眼前的是非争论所左右。“三通过”,就是只有把事情弄清楚了,是非曲直心里有了底,政策界限把握了,才能有所行动。

## 三.如何对待纯学术研究

在大学中,总会有这样一些教师:他们埋头读书,潜心做学问,致力于纯学术研究,颇有一种“学海无涯苦作舟”的精神。他们唯一追求的是学术价值,至于学术成果如何转化、如何应用、如何服务,则不大关心。对政治活动,他们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,不过问,也不参与。既不为现实的政治服务,不为当局的政策注释,也不与现实的政治作对,不惹政治的麻烦。

对现实生活中的事情,他们采取超然的不偏不倚的立场,“用第三只眼睛看世界”,有时也会说一些不合时宜、不识时务的话。对于专业领域的事,他们很“精”;对专业以外的事,他们很“傻”。这些教师如果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一定会被认为是“三脱离”(即脱离政治、脱离社会、脱离群众)的知识分子,是走“白专道路”。在今天,也会被一些人认为是思想上政治上有问题的人。

我们大学中应当养一些这样的学者,让他们埋头去做自己的学问,不必强人所难,非要他们去参与政治活动,从事现实服务。一个国家、一个单位,人人关心政治、人人参与政治,并不一定是好事情,如果让不懂政治的人去参与政治,反而会闹出许多荒唐事,惹出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在当今商业味很浓、功利心过重的环境中,他们能耐得住寂寞,坐得住冷板凳,静心做学问,倒是很可贵的。这种“书呆子”,比那些急功近利、喜欢凑热闹的学者要好出许多。

对待大学的学术研究历来有两种态度:一种主张与社会经济政治紧密结合,一种主张与社会经济政治保持距离;一种主张为现行的国家战略服务,向社会提供即时的直接的利益,一种主张只要做好学问,发展科学文化,那就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,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进步。这两种态度应当结合互补,不宜偏废。我们的大学,既应当鼓励多数教师关注社会需求,服务国家战略,也应当允许一些教师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出发,超脱现实的功利,从事纯学术研究,去追求更加遥远的目标。

《从清华园到未名湖》任彦申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年6月第1版)

(《从清华园到未名湖》在本报连载以来,社会各界好评如潮,纷纷询售。特告读者:各新华书店社科柜均售此书。)